

认知与决策领域的中国研究现状分析

谢晓非 郑蕊

(北京大学心理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由于决策科学对于社会经济建设有着直接的意义, 所以一直是诸多学科的研究焦点。中国在认知与决策领域经过二十几年的积累, 在相当广泛的课题上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该文对近年来国内决策科学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其特点为: (1) 研究主题广泛; (2) 与国际前沿课题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但仍然缺乏系统性。 (3) 结合实践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同时, 该文也尝试对该领域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 目的是抛砖引玉, 更好地促进中国决策科学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 决策科学, 认知与决策领域, 理论与应用性研究。

分类号 B849:C93

小到个人择业或企业投资, 大到国家政策制定, 决策可以说无所不在, 并且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对决策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所关注的焦点问题。2002年, 心理学家 D. Kahneman 因为在决策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对 D. Kahneman 本人数十年研究的肯定, 更代表了人们对于决策科学领域的关注。中国决策科学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 发展速度也比较平缓, 但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却相当广泛。中国学者从基础理论到多个领域的应用研究都有所涉及。本文拟对近几年来国内决策科学的研究进行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并尝试对该领域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 目的是抛砖引玉, 以更好地促进中国决策科学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 初步的理论探索

据不完全统计, 在国内决策科学研究领域中, 属于理论研究的比例大约占到 52%, 其主要涉及到风险认知与决策、决策认知结构和群体决策三方面的内容, 其中风险认知与决策方面的研究, 单就数量而言最为丰富。

1.1 风险认知与决策

风险决策是指决策者在面临两个以上不确定的决策后果, 尤其是在面对伴有负面结果的可能性时所产生的复杂心理过程。风险决策常常涉及多个不确定性的负面结果, 因此, 个体所知觉到的风险情景也不会是单一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心理状态的复杂程度, 往往使得风险决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特色, 同时也具有一定难度。尽管如此, 国内研究者对风险决策的理论探讨, 无论是就数量而言, 还是就研究深入的程度而言都是值得一提的。

1.1.1 风险性质与风险情景的界定

风险问题涉及广泛的社会观念, 因而民族和文化背景都会影响民众风险意识的形成。如何定义风险应该是中国学者在风险认知与决策领域研究中碰到的第一个理论性问题。国内较早涉及该课题的学者, 谢晓非、徐联仓^[1]采用自由联想的方法对风险的性质进行了探讨, 结果发现风险一词具有广泛的含义。在所有被联想到的词汇中积极类词占 27.5%, 中性类词占 40%, 消极类词占 32.5%, 作者因而认为风险对个体的意义可以在积极—消极两极间连续过渡。同时, 通过对词频的统计, 作者指出与经济概念有关的联想词,

收稿日期: 2003-03-25

通讯作者: 谢晓非, 电话: 010-62759999, e-mail: xiaofei@pku.edu.cn

不仅所占比例较大，而且频率也较高。

我们知道，风险认知与决策的研究源于西方，针对中国被试的研究如果直接采用西方学者对风险的定义，会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和感受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导致概念上的偏差。要想准确定义本民族所具有的真实的风险概念，就必须直接从中国人的样本中获取数据。从上述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对风险的认识具有其特殊性，它可以对个体同时意味着损失与收益，因而导致个体接近与回避并存的心理特征。西方学者对风险概念或性质的探讨很多，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 Yates 和 Stones^[2]提出的风险要素理论，他们分析了风险在不同情景下的具体表现方式，指出风险是由三个要素组成：即损失、损失的重要性、损失间联系的不确定性。其中“损失”是一种情景特征，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可以包括财政、效绩、安全、心理、社会地位、时间等多方面。“损失的重要性”指损失对于个体的重要程度，也就是对于个体而言，结果越重要，那么它对应的风险也就越大。“损失的不确定性”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即冒险行为的不确定性、损失类别的不确定性、对于发生某类损失的感知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等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风险性质的定义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细微差别，甚至这种差别只是语义上的，或词汇表达的内涵与外延的不同。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却是必须而且重要的。

另外，风险情景是学者研究个体对风险反应的载体，因此，对风险性质的探讨往往会涉及对风险情景的描述和讨论。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Kahneman^[3]就在预测理论中指出情景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他认为在损失情景中个体的行为倾向于冒险，而在获益情景中个体的行为则倾向于保守。由此可见，在我们使用风险情景来探究人们风险偏好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情景对个体的风险认知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国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讨：谢晓非、徐联仓^[4]发现风险情景的变化是个体认知策略调整的直接诱因，情景风险的高低与对情景的可控性都将会影响个体的冒险行为。相关研究结果表明高风险情景抑制了冒险倾向，反之，低风险情景则诱发了冒险性选择。同时，对风险情景的可控感将导致高冒险倾向。在对风险情景可以控制的条件下，过程信息的作用更明显，而在不可控的条件下，频率信息则显得更为重要。谢晓非、郑蕊、蔡鹏^[5]随后对情景的性质、类别与量值大小进行了研究，结果清晰地反映出情景特征的作用：“获益”和“损失”情景能够影响个体的冒险倾向。并且表现为“获益”情景下的风险偏好指数显著高于“损失”情景下的风险偏好指数。同时，情景“类别”特征也影响了被试的冒险倾向，比如，表现为个体在交通事故罚款与还债情景中冒险倾向的差异；而“量”的额度对个体冒险倾向也产生显著性影响，并与情景产生交互作用。

上述关于风险概念与风险情景两方面的研究，反映出我国学者对认知与决策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关注。这些理论探讨虽然是初步的，但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很有价值的。

1.1.2 风险认知与风险偏好研究

风险认知与风险偏好的研究都是对个体风险知觉的探究，但两类研究的着眼点略有不同：风险认知的研究是对个体风险知觉的直接测量，而风险偏好的研究则是通过测查个体的行为倾向来反推其风险知觉。对于风险知觉的揭示是其他一切风险研究的基础。我国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涉及了三个领域。

(1) 风险认知与风险偏好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危机感和竞争意识给处在变革时代的人们以极大的冲击，那么个体一般性社会风险认知的现状是怎样的呢？谢晓非、徐联仓^[6,7]采用问卷研究的方法对工作情景中管理人员和员工的风险知觉分别进行了测量。其结果表明无论是对管理者来说，还是对员工来说，企业效益都被知觉为最高风险点。企业类型（工厂或公司）的不同会导致个体产生不同的风险知觉。同时，对管理者的调查表明企业经营策略与企业效益有很高的相关。

不同的个体对相同的情景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正像 Mellers (1994) 所指出的一样，没有一种简单的判断模式可以描述全部的风险判断行为，因为这个行为不仅会受到诸多情景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

受制于个体本身的风险偏好。Lola Lopes, Oden G.C^[8]的研究表明冒险性的不同会直接影响被试的认知：冒险的人更关注于好的结果，而保守的人更关注于不好的结果。我国的研究者李劲松、王重鸣^[9]则将这种分类更加具体化。他们发现在被试身上存在着 4 种风险偏好类型：理智型，S 型，复杂型，风险追寻型。不同风险偏好的类型，不同风险任务判断结构会对风险判断模式产生不同影响。双极值的任务结构与风险偏好的交互作用显著，说明风险偏好类型对风险判断的作用受到损失期望值与获益期望值不同组合的影响。单极值的任务结构与风险偏好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被试的风险偏好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被试的风险判断模式。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基本上是将风险认知与风险偏好视为两类变量来进行研究的。但事实上，风险认知与风险偏好是测量个体风险倾向的两个角度。就测量范式而言，因为采用心理测量的方法，有关风险认知的研究有可能较大规模取样，并可以涉及多个变量，因此数据涉猎面广，能够更加全面地探讨相关变量或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而风险偏好的研究多局限于实验室情景，不能涉及太多变量，但却能够靠精确控制实验条件，获得更准确的变量间关系，比如因果关系的推论。将两类研究的优势结合起来，应该成为今后风险研究在方法方面发展的思路之一。

(2) 关于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探讨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个体的风险认知要受到内在人格因素与外在情景因素的双重影响。国外研究者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动机、情绪、专业背景以及外在情景类别、信息构成，乃至文化氛围都将对个体的风险认知造成影响。

关于这一领域的探讨在国内还处在起步阶段，除了情景对个体风险判断影响的研究外，国内研究还注重测量个体内在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就动机上。谢晓非、王晓田^[10]对成就动机，冒险倾向和机会-威胁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高成就动机组以强烈的争取成功的倾向导致其对机会的积极认知；低成就动机组则以对失败回避的趋力强化了威胁认知。个体在风险情景中的行为倾向与认知反应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比如，框架效应的确存在，但又不是普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某类风险情景之中。方差分析证实风险情景与框架效应之间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被试保守倾向的反应受到情景与框架效应的交互影响；另外，风险情景即“获益”和“损失”极大地影响着被试的风险反应模式。稍后，谢晓非、李育辉^[11]研究发现，成就动机作为较为稳定的个性特征之一，对个体在风险情景中的反应方式和机会-威胁认知都有重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个体回避失败的动机越强，其在风险情景中的行为倾向就越趋于保守，对此情景的威胁认知水平也越高。而机会-威胁认知对于个体在风险情景中的行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机会认知变量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

(3) 偏好反转的研究

Lichtenstein 与 Slovic^[12]最早发现了偏好反转现象。这种现象是指在期望值大体相等的一对博弈中，人们往往选择购买概率高，而损益值小的博弈（安全博弈），却对概率低，而损益值大的博弈（风险博弈）高价售出，也就是说人们在购买定价与售出定价中表现出偏好不一致的现象。偏好反转现象是决策科学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领域，但是我国学者目前涉及该领域的研究却并不多。正因为如此，张玲的研究^[13]尤其值得一提。在对前人研究进行综述后发现，以往国外研究中所涉及的概率只限于 20%~30% 之间，几乎没有出现低于 10% 的小概率。为了更好的考察偏好反转的存在条件，以及风险任务特征与偏好反转的关系，她采取引入极小概率博弈，增加情景被试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定价中偏好风险博弈的倾向与选择中偏好安全博弈的倾向更稳定；即使人们普遍地表现出风险寻求时，偏好反转也并未消失，因此，在选择中普遍的风险回避并非偏好反转的必要条件。

风险偏好反转的现象还可以其它方式表现出来，比如，信息多维度特征是企业经理人员面临的真实决策环境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不可能像实验室被试一样仅依据一两条信息进行决策，相反，他们所面对的

往往是几十条，甚至是上百条不确定的信息。研究发现，个体对信息不同侧面、类别、数量的把握上都有相当的局限。个体有限理性的特征证明其无法承载过多的比较与选择，当我们对两个以上的选择进行类比时，如果其可比的方面多于一个，就是所谓的多维度类比。在多维度类比的条件下个体的决策会发生“选择偏好反转”等现象。因此，将已有的研究结论应用于真实的组织环境之中，对一些几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比如，在信息多维度情景中，个体偏好反转的条件是什么？信息维度的数量如何影响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过程？维度多到什么程度会导致信息处理障碍？信息维度的性质，比如信息维度的同质或异质，是否影响个体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过程？将会有助于该研究主题朝向实际应用的方向发展。

1.1.3 框架效应研究

采用不同的描述方式对同一问题进行描述时，个体应该表现出相同的偏好。但是，Kahneman 与 Tversky 却发现人们对一个备择方案或风险方案的二择一决策会受到言语表述的影响，他们将这种由于描述方式的改变而导致被试选择偏好发生改变的现象称之为框架效应^[3]。Kahneman 与 Tversky 运用 S 状的价值函数和非线性权重函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认为被试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在个体损失情景中更倾向于冒险，而在获益情景中更倾向于保守所致。李纾^[14]却发现这种解释不够充分，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些实验的结果。因而，他综合前人的理论与自己对于相应问题的实验性研究成果，提出了“齐差求辨”模型。他指出当问题是采用消极方式描述时，被试是“在最好可能结果之间进行取舍”，而当问题是采用积极方式描述时，被试则是“在最坏可能结果之间进行取舍”。通过“匹配”技术的测查，他认为“齐差求辨”模型在解释框架模型时更为有效。李纾（1996，1998，2000，2001，2002）为获得更合理的解释，对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这种就一个问题由小及大的研究思路特别值得国内同仁效仿，尽管“齐差求辨”模型本身的完备可能还需要更多实验数据的支持。

1.1.4 风险决策的动态分析

传统的决策科学都是采用静态模式进行研究的。然而生活是动态的，所以通过决策范式研究出的结果并不能推广到现实的生活中。John R. Hollenbeck Daniel R. Ilgen, Jean. M. Phillips 等人^[15]发现在使用风险决策研究的经典范式研究动态过程中的决策时存在着一些缺陷，其表现在：（1）动态过程中的框架效应与静态过程中的有所不同；（2）经典的研究范式不能考察以往的操作水平对当前决策的影响；（3）经典研究范式没有涉及到目标具体性问题；（4）经典研究范式弱化了典型决策选择过程的丰富性和潜在模糊性。正是因为这些局限的存在使得众多研究者都将注意力转向了动态研究。我国学者王重鸣、梁立^[16]采用计算机联网模拟团队分布式互动风险决策任务，从三个方面（过去绩效、启动基金和目标设置）对决策者在动态条件下风险偏好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目标的设定对团队的风险偏好有影响，而对个体风险偏好的作用则需要通过启动资金才能体现。启动资金对团队和个人决策都无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与过去绩效和目标设定的交互作用来体现的。综上所述，研究者认为风险敏感性同样适用于解释动态情景下的风险偏好。随后，谢晓非、王丽、周俊哲^{*}采用计算机模拟和问卷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成就动机的个体在动态情境下的冒险行为。研究结合成就动机的静态与动态理论，考察具有不同程度的成就动机个体在动态环境中的行为差异。实验结果表明：（1）在动态情境的初期，可以看到不同成就动机的被试有稳定的偏好：成就动机高的个体偏爱中等难度的任务，成就动机低的个体偏爱极端难度的任务。（2）随着行为的动态进行，个体的冒险行为呈现出与静态情境中不同的规律性：成就动机高的个体在初期选择的中等难度的基础上逐渐选择更难的任务；成就动机低的个体在初期选择的较易难度的基础上也逐渐选择更难的任务；相对于成就动机低的个体，成就动机高的个体会更慢地选择难度高的任务。尽管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不多，但对动态决策模型研究的尝试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将成为今后决策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2 决策知识结构的研究

* 谢晓非，王丽，周俊哲. 计算机模拟情景中冒险行为的动态研究. 待发表

随着管理决策研究与决策专家系统研究的不断兴起,探究决策者的知识结构也成为研究的一个焦点。王叶毅、王重鸣^[17]采用全方格技术对决策知识结构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无论是对抽象概念组,还是具体概念组来说,如果所给予的标准是清晰的,那么所获得的决策知识结构就比较具有规律性,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则,反之,结构就会比较混乱。同时,当进行区分的维度标准是清晰的时候,同一组概念的认知结构就会比较接近,因素间的区别也比较小,结构较明确,反之则较差。将知识和规则的获取与表征这些传统的心理学研究与决策领域相结合,形成管理决策与决策专家系统研究的新趋势。这一趋势有可能成为结合理论探讨与实际应用的最佳途径,非常值得在认知与决策领域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家的重视。

1.3 群体决策

个体决策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主观性强、信息量少等,而群体决策的优势则可以更加广泛地利用群体提供的信息,对备择方案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从而弥补个体决策的种种缺陷。当然,群体决策同样也存在问题。Stasser G, Titus W^[18]从信息取样的角度对影响群体决策质量的因素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有偏差的信息取样模型”。他认为当讨论是无结构的,且讨论的内容是判断任务时,群体会出现两种偏差:(1)讨论朝着分享性信息方向偏移;(2)讨论朝着群体讨论前偏好的方向偏移,从而使群体不仅不能纠正个体事先存在的偏差,反而会加剧这一偏差。

我国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也从正反两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梁立、王重鸣^[19]调查启发式在警觉任务中的作用时发现团队结构可以克服个体决策中出现的信息不全和信息加工资源不足的缺陷,使警觉任务在关键事件发生时,发生前和发生后的成绩波动不大。这表明在一些任务中,群体决策确实有其优越性。

那么群体决策是不是一种最优的决策方式呢?郑全全、朱华燕、胡凌雁等^[20]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群体选择一开始就受到大多数成员支持的候选人,而非实际的最佳人选,群体决策不但没有纠正个体决策的偏差,反而加强的这种偏差的作用。通过对 Stasser 信息取样模型的进一步分析,郑全全、朱华燕^[21]发现在自由讨论条件下,如果讨论前群体偏好是一致的,那么群体倾向于讨论分享信息,及所偏好的候选人信息;而在讨论前群体意见不一致时,则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同时,群体规模和任务难度都会影响群体决策的质量。群体规模的增加会加大对于分享信息的讨论,而对非分享信息则没有什么影响。在任务难度方面,只有在难度大的任务上才会出现分享信息的讨论优势。朱华燕、郑全全^[22]对 MAU(多特征效用模型)与自由讨论两种决策程序对群体决策质量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MAU 可以较好克服群体动力学方面的一些消极影响,充分挖掘信息,但 MAU 程序在被试态度和社会交互作用等心理效标上并未显示出优势。在 MAU 条件下,群体规模对分享和非分享信息的讨论量无显著影响,而任务难度与群体规模一起才能起作用。

有关群体决策问题的研究相对个体决策而言更为复杂,在研究方法上有更高的要求。因打@ 培关 涪樾 涪樾 s屨麟踏

重鸣^[24-26]从 2 个角度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一方面他们探讨了人事决策信息利用和效能预测的特点，而另一方面他们同时探讨了人事决策者的特点对人事决策过程的影响。这些研究对招聘者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事决策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3) 新产品开发决策：今天的社会是变革的社会，因而如何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并能及时调整企业的策略来适应这种不确定性必将成为组织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郑全全^[27-29]以新产品开发这个具体问题为出发点对影响组织的宏观动力场因素进行了探讨。他的研究从宏观工效学的理论出发，综合探讨了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微观、中观、宏观水平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并对宏观因素形式变化的主要维度进行了揭示。尽管心理学的研究者善于从微观的视角入手进行研究，但是在应用性决策科学的领域中，从宏观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可能会为我们提供很多微观研究所无法涉及的重要因素。(4) 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是投资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往的国外研究大多是从数量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因而存在着缺乏动态性，忽视情景因素和决策特征在风险投资决策中的作用；重宏观经济，而轻微观分析等问题。王重鸣、陈学军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30]首先采用多特征效用理论与方法在理论上对投资决策风险及其特征进行了重新界定，随后^[31]对影响投资决策风险的诸多因素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释。

应用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在决策领域更是如此。我们注意到，在理论问题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同时也关注了某些重要的应用性课题，这将非常有利于将某些理论性的成果迅速地应用于实践。但值得注意的是，应用性课题有其特殊的性质，由于与实际情景联系在一起，必然涉及大量的变量，实验条件的控制也非常困难，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也留下了很大的、可以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3 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纵观整个决策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从理性决策者假设到非理性决策者假设，该学科经历了一个理论逐渐完善的过程。在决策科学发展的早期，最为学者广为接受的理论是由 Von Neumann 与 Morgenstern (1953) 所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其决策是依据对效用值的精确计算来进行决策。尽管期望效用理论为决策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决策现象，因而研究者不断尝试对决策模型进行修正。1978 年，Simon 因为提出个体的“有限理性”的假设，从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越来越多学者尝试在这一新的思路上进行他们的决策研究。在西蒙之后的研究者中，认知心理学家 Kahneman 无疑是最有成就的一位。他与 Tversky 一起发现了很多期望效用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如确定性效应 (certainty effect)、隔离效应 (the isolation effect)、镜像效应 (the reflection effect) 等。最终，他们在一系列认知心理实验的基础上提出预测理论 (Prospect theory)，这标志着运用描述模式 (descriptive model) 对个体决策问题的研究有了更系统的思路。Kahneman^[3]将个体的决策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编辑阶段与评价阶段。编辑阶段由 4 部分所构成，分别为编码、合并、分解、删除。在这个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在评价阶段，Kahneman 与 Tversky 提出了一个价值函数用于测量相对于参照点的赢得和损失的主观评价。这个函数有两个主要的属性：(1) 这个函数在获益情况下为凸线型，而在损失情况下则为凹线型，即个体在获益情况中个体倾向于保守，而在损失情况下倾向于冒险。(2) 在参照点附近，损失比赢得更为陡峭。正是因为预测理论成功地揭示了个体非理性的决策过程，2002 年 Kahneman 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

3.1 目前中国该领域研究的特点

国外成型的研究理论与先进的研究思想为我国决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目前我国的决策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国内学者在相当广泛的主题上进行了研究。从上述论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国学者的研究涉及到了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为我国决策科学的发展创立了一个较为广泛的基

础。第二,与国际前沿课题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但仍然缺乏系统性。一些学者正在尝试围绕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基本上没有发现几位学者同时以自己独特的角度,对相同问题进行探讨。因此,从整体上看,国内目前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第三,结合实践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决策科学的发展与实践的需求密切相关,我国学者对于决策理论在实践工作中的运用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突出了这门学科的应用性特征。

3.2 未来的发展

Simon 和 Kahneman 两位心理学家,在相隔并不长的时间里并在同一领域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决策科学集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于一体,可以成为对社会经济建设有直接贡献的学科。分析目前国内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将来的研究重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1) 加大研究的系统性

尽管国内学者对决策领域的研究涉及面很广,而且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建树,但是显然这些研究还不够充分,尤其缺乏系统性。因而,对现有领域的系统化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我们知道决策科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的阶段,只有当学者们形成自觉的意识,并能够在研究中形成以具体课题为导向的,有形或无形的研究团队才能使这个领域的研究更为系统和规范。

(2) 体现中国特色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西方经典的决策理论并不一定适合中国被试,因而,借鉴西方成型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探究中、西方被试在决策领域所体现出的行为差异,推行本土化研究模式也将成为一大趋势。中国学者在建立中国人认知与决策模型,探讨中国人的认知与决策特征的努力中,应该成为最积极、最重要的贡献者。

(3) 形成有效的研究方法及测量手段

对西方成型量表进行本土化修订,编制符合中国特色的研究问卷,形成一套系统有效的研究模式也是今后必须重视的一个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 [1] 谢晓非,徐联仓. “风险”性质的探讨. 心理科学, 1995, 18(6): 331~345
- [2] Yates J F, Stone E R. Risk-taking Behavior.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1992. 1~25
- [3] Kahneman D, Tversky A. Choices, Values, Frame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43
- [4] 谢晓非,徐联仓. 风险认知策略的计算机模拟实验. 心理学报, 1996, 28(2): 192~200
- [5] 谢晓非,郑蕊,蔡鹏. 风险情景对大学生冒险倾向的影响.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02, 2(6): 68~71
- [6] 谢晓非,徐联仓. 工作情景中员工风险认知研究. 应用心理学, 1999, 5(1): 20~24
- [7] 谢晓非,徐联仓. 工作情景中管理人员风险认知研究. 心理学报, 2000, 32(1): 115~120
- [8] Lola Lopes, Oden G C. The Role of Aspiration Level in Risk Choice: Comparison of 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and SP/A Theory.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43: 286~313
- [9] 李劲松,王重鸣. 风险偏好类型与风险判断模型的实验分析. 人类工效学, 1998, 4(3): 17~21
- [10] 谢晓非,王晓田. 成就动机与机会威胁-认知. 心理学报, 2002, 34(2): 192~199
- [11] 谢晓非,李育辉. 风险情景中机会和威胁认知. 心理学报, 2002, 34(3): 319~326
- [12] Lichtenstein S, Slovic P. Reversals of preference between bids and choices in gambl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71, 89: 46~55
- [13] 张铃. 风险任务特征与偏好反转的实验研究. 人类工效学, 1999, 5(2): 9~12
- [14] 李纾,房永青,张迅捷. 再探框架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00, 32(2): 229~234
- [15] Hollenbeck J R, Ilgen D R, Phillips J M et al. Decision Risk in Dynamical Two-Stage context: Beyond the Status quo. Journal of

applied of psychology, 1994, 79 (4): 592~598

[16] 梁立. 风险决策中动态框架效应研究. 心理学报, 1998, 30 (4): 394~400

[17] 王叶毅, 王重鸣. 决策知识结构的全方格诱发与分析. 人类工效学, 1996, 2 (1): 5~8

[18] Stasser G, Titus W. Pooling of unshared information in group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5, 46(6): 1467~1478

[19] 王重鸣. 启发式在警觉任务中的交叉复合作用. 心理科学, 2000, 23 (1): 68~72

[20] 郑全全, 朱华燕, 胡凌雁等. 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取样偏差. 2001, 心理学报, 33 (1): 68~74

[21] 郑全全, 朱华燕. 自由讨论条件下群体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 2001, 心理学报, 33 (3): 264~269

[22] 朱华燕, 郑全全. MAU 程序和自由讨论的群体决策质量比较. 心理学报, 2001, 33 (6): 552~557

[23] 马剑虹, 王重鸣. 组织决策的影响力分布特征及中英比较. 应用心理学, 1996, 2 (1), 23~29

[24] 王益宝, 王重鸣. 人事决策信息利用和效能预测模型. 应用心理学, 1995, 1 (1): 42~48

[25] 王益宝, 王重鸣. 人事决策判断的特点及支持策略. 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 1994, 4 (3): 89~96

[26] 王重鸣, 王益宝. 人事决策专家与新手的知识诱发和 multidimensional 空间结构分析. 人类工效学, 1995, 1 (1): 19~23

[27] 郑全全. 企业新产品开发决策的不确定性和决策策略模拟实验研究. 心理科学, 1994, 17 (4): 205~211

[28] 郑全全. 管理人员对影响新产品开发决策宏观动力场因素的认知. 心理学报, 1994, 26 (3): 255~263

[29] 郑全全. 组织的作用空间研究. 人类工效学, 1997, 3 (3) 16~21

[30] 王重鸣, 陈学军. 投资决策的周边组织因素和多阶段评估. 心理科学, 2002, 25 (1): 7~9

[31] 王重鸣, 陈学军. 投资决策风险的多特征效用评估. 人类工效学, 1996, 6, 2 (2): 7~11

ANALYSIS OF CURRENT CHINESE RESEARCH ON COGNITION AND DECISION

Xie Xiaofei, Zheng Ru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For years the decision science has always been the research focus of many disciplines because of its direct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al construction.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have already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tried to summarize these achievements that are characterized in: (1) the bread range of research topics; (2) high consistenc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research but still lack of system; (3) beneficial exploratory researche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Besides, this article tried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rend in this fiel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search on decision science.

Key words: decision science, the field of cognition and decision, academic & applied research.